

驰骋豫东南 血流三河尖

——易宗邦烈士传略

李宏茂

易宗邦，号经安，化名老漂、大胡。1898年出生于商城县观庙乡林湾村王大堰庄。易宗邦小时家庭异常贫困，依靠父亲易培之扛大扁担（肩挑运输）维持生活。后来积攒了一些钱，置田地五十石，以耕田为生，生活逐渐好转。

易宗邦兄弟三人，他排行老末。少年时期在观庙大慈庵明德高等小学上学，1918年考入商城县乙种蚕桑学校学习，1921年进省立潢川第七中学，1923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。

在潢川第七中学就受到新思想启蒙教育的易宗邦，踏入上海这座革命的熔炉，马上被革命的浪潮所吸引，实现了他多年向往革命的志愿。他性格开朗，善于交际。入校不久便结识了很多进步同学，积极参加学校“读书会”的活动。他除了刻苦学好各门功课外，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，阅读了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，思想受到很大启迪，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。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。其间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贺昌、任弼时等革命家。

1923年下半年，贺昌由太原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，并进上海大学学习。在他深入学校开展学生运动中，结识了追求

进步，倾心革命的易宗邦。参加社会斗争实践和接触马列主义理论。使易宗邦眼界开扩了，阶级观点明确了。1924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从此，他在党的领导下，更加积极地投入上海青年运动，辛勤地为党工作。

1925年春，担任团中央工农部长和组织部长的贺昌、任弼时，为了广泛发动上海青年学生投身革命，加强上海学生联合委员会主办的《上海学生》杂志的编辑力量，分配易宗邦担任《上海学生》杂志的编辑。易宗邦才思敏捷文章出众。为了不负党的重托，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，唤起百万学生投身革命，在《上海学生》杂志的编辑工作中，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。他白天坚持听课，空时出外采访，晚上回来写稿、改稿、组织编印，直至深夜。有时为了反映突变的斗争形势，要争时间，他往往只是买些馒头，在写字台前边吃边写，甚至通宵达旦地挥笔疾书。震惊全国的“五卅惨案”在上海爆发后，为了及时地揭露日美帝国主义制造惨案的罪恶事实，号召全市学生投入这一反帝运动，他总是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撰写稿件，编辑《上海学生》。他写出的文章象锋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，象响亮的号角鼓舞着广大青年和学生团结战斗。

在办好《上海学生》杂志的同时，易宗邦还经常深入学生中间，倾听他们对《上海学生》杂志的反映，并帮助他们

提高觉悟，团结一道革命。如和他一同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的蒋明华，初到上海，思想空虚，常常陷入沉闷的困境。易宗邦就经常找他谈心，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并找来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、《上海学生》等进步书刊介绍给他学习。在易宗邦等党团员的帮助下，使他思想觉悟逐步提高，积极投入火热的革命运动，并于1926年10月经易宗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6年10月，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，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。易宗邦参加了这次起义的斗争。起义前，他在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召开活动分子会，组织学生宣传队，上街张贴、散发传单，宣传演讲，并组织学生罢课，实行总同盟罢工。起义中，他又和同学们一起，身临第一线，与工人并肩战斗。

实际斗争的锻炼，不仅使他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技巧，而且使他认识到革命武装的重要。12月当沈雁宾在上海替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密招生时，易宗邦毅然投笔从戎，报考了武汉军校，下定决心，为涤荡旧世界，建设新世界拿起枪杆子。

1927年2月上旬，易宗邦携带着武汉军校录取证，满怀革命激情，同赴武汉同学一起乘轮北上，到达武汉后，恰逢贺昌也由上海派往武汉，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，对易宗邦了解甚深的贺昌，觉得把易宗邦留到湖北学生联合会工作

比去军校学习作用更大，就没让易宗邦进军校，而让他担任《湖北学生》杂志的编辑。易宗邦又欣然服从组织分配，为办好《湖北学生》杂志不遗余力。从此，他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。

此时，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，政治空气异常活跃，《湖北学生》杂志在团结和指引广大青年学生起来革命，进行斗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1927年春夏之交，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消息传到武汉，激起了各界革命人士极大的义愤。从4月中旬起，《湖北学生》杂志集中报道武汉青年学生反蒋斗争的怒潮。易宗邦不断为《湖北学生》杂志撰文。他以犀利的笔锋，辛辣的文词，揭露了蒋介石等新军阀自1926年“中山舰事件”以来，任意“变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决议案”，“变更总理所留给全国同志的革命政策”，“压迫上海工人，解除其武装”的罪恶事实，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起来声讨蒋介石，坚持团结战斗。

7月15日，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，在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的反革命口号下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，使生气勃勃的武汉顷刻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此时，易宗邦根据党的指示，回河南潢川县负责开展党的工作。

7月下旬，易宗邦来到潢川县，与潢川党组织接上关系。面对逆转的时局，他沉着、冷静，把疏散在城内的十一名党

团员召集一起，分析国内外形势，指明斗争的残酷性和曲折性，决定转变斗争策略，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学校和农村，积极发展党团组织，建立农会。并在这次会议上，将中共潢川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潢川县委，易宗邦当选为书记。

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他为了在潢川站稳脚跟，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，利用他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学历和潢川七中母校的关系，活动到潢川七中担任美术教员。这样不但可以掩护身份，而且更便利接近学生和群众。他很快在七中发展了张刚亚、郭宝瑜、张志新等十多名进步学生入团，建立了七中团支部，书记张季良。同时，他还利用课外时间深入四乡，对家住乡村的七中老同学进行革命宣传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。在此基础上，再向周围群众进行宣传，秘密组织农会，发展党员。不久，在城西的云台山、淮风集发展了董学敏、胡国勋，城北的包信集发展了刘钻志，南乡彭家店发展了郑长荣，城区发展了费醒初、张真吾等人入党。并将大革命失败后从外地回乡的徐智雨、江梦霞、朱树川、张彦武、冯新宇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，很快在大荒坡、苏家楼、伞陂寺、陈集、张岗、七中、苏家大院等地建立了党支部（或小组）。

1927年10月，党的“八七”会议精神传达到潢川。易宗邦根据“八七”会议确定的“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”的总方针，及河南省委通过的《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》精神，积极发动群众，组织农民武装，

并选择了与商城、固始三县交界的大荒坡为长期农运基点，派江梦霞、徐智雨到大荒坡协助张彦武、张相舟组织农会，联络红枪会，开展工作。

实行武装暴动，组织农民起义，必须掌握武器才行。在筹措资金，购置枪支弹药问题上，易宗邦以革命者的宽大胸怀，不惜“欺骗”父母，向家索取。他写信于父，谎说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“绑票”，赎金要六百元，约定交钱的时间和地点。家里信以为真，卖了八石课，凑齐了款子，按预定时间、地点交付。易宗邦得到这笔钱后，全部交给了党。在他的带动、影响下，青年团员张禹仁将家中珍藏的一只翡翠镯和一块文天祥用过的古砚，私自拿出来交给党组织，变卖了三百元。县委用这两笔钱买了两支手枪和子弹。

11月中旬，“黄麻起义”和稍后的信阳四望山农民暴动，促进了豫南革命运动的开展。这年冬，易宗邦邀请固始、商城党组织负责人在大荒坡张家前楼张彦武家举行三县联席会，讨论武装暴动问题。大家认为，大荒坡是潢固商三县交界的地方，距三县城均六七十里，国民党统治力量较为薄弱，而潢川县委在这里工作有相当的基础，革命力量较为雄厚；且大恶霸张秋石豢养着三十余团丁，横行乡里，鱼肉人民。农民们早已深恶痛绝。解决了张秋石，可为大荒坡农民消除一害，并能夺取枪支，武装自己。会议决定，在大荒坡举行武装暴动，夺取张上寨张秋石的枪支，建立革命武装，实行

武装割据，并决定由潢川县委去发动、领导这次斗争。经过充分准备，1928年2月11日（农历正月二十）深夜，易宗邦亲率县委成员和七中三十多名学生组成的武装队伍，向张上寨进行了突然袭击。张秋石及其豢养的团丁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惊慌失措，纷纷越墙逃跑，当场击毙张秋石的母亲、祖母及其孪生哥哥等眷属七人。

夜袭张秋石不久，中共河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结束，省委委员汪厚之被派来潢川，组建了中共南五县特委，汪厚之任书记。易宗邦及时地向特委汇报了大半年来潢川的工作，以及夜袭张上寨的经过。特委肯定了潢川县委的工作，认为夜袭张上寨是正确的。并决定加强对大荒坡农民运动的领导，准备发动大荒坡农民武装暴动。此后，易宗邦在南五县特委的领导下，更加积极地为起义而奔忙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后，中共南五县特委决定3月18日举行大荒坡武装暴动。3月16日，易宗邦亲临大荒坡，协助特委制定方案，布置暴动事宜。这次暴动，由于受“左”倾盲动主义影响，惨遭失败。但易宗邦没有被挫折所折服，他向同志们讲道：“革命就会有牺牲，没有牺牲就不能称其为革命。同志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，它唤醒了广大群众，为我们下次的暴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。”由于易邦的出色工作和组织才能，4月，当选为中共南五县（临时）特委委员。

1928年8月，易宗邦由潢川调任商城县委书记。为了便

利工作，其爱人梁义贞（固始县人，开封北仓女中毕业）随同来商工作，将县委机关设在县城南关蒋家老宅子。此时，商城县委正为贯彻党的“八七”会议精神，“发动商城南乡的农民暴动”而积极工作。为了保证这一暴动计划的尽快实现，易宗邦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，经常深入学生、工人和农民中去。他走到哪里，总是把政治工作做到哪里，把革命思想宣传到哪里。在接收刘复生等青年学生入党宣誓会上，他亲切地教育新党员：“应在党的领导下，虚心学习听党的话，在复杂的环境中锻炼自己，要慎重地大胆地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。”一次，在和刘复生去城西马鞍山煤矿途中，他问刘道：“你说我们共产党象什么样？”刘复生脱口回答：“我们共产党是打富济贫的。”易宗邦温和而兴奋地说：“你只说对了一点点。共产党伟大的很，要干翻天覆地的事业，要把这个世道变过来，叫穷人翻身得解放。”

商城马鞍山煤矿是一个拥有二三百名工人的小煤矿，距县城 20 华里。1880 年才由当地农民开采，后被杨姓地主所霸占。工人生活十分低下，生命没有丝毫保障，广大工人积郁着对矿主的忿怨、反抗怒火。易宗邦到商城后，十分重视煤矿工人这支力量，他经常深入煤矿工人当中，和他们促膝谈心，同吃同住，了解工人生活情况和要求，联系工人的痛苦遭遇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，解释工人为什么受苦，矿主为什么不劳动反而享福，提高他们的阶

级觉悟，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。在易宗邦的宣传教育下，煤矿工人很快觉悟起来，并发展了彭孝中、管德安等六名工人入党，建立了马鞍山煤矿党支部。广大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为反对压迫，改善生活，积极开展斗争。

1928年大旱，商城粮食歉收，一半农民没有饭吃，而地主的残酷剥削，军阀的横征暴敛和兵灾匪患有增无减。县政府为了支应兵差，发行一种不兑换的纸币，名曰“流通券”。农民辛勤劳动的产品，换来的只是一把废纸。到处是怨声载道，叫苦连天。易宗邦耳闻目睹这一切，决定领导群众开展反对“流通券”的斗争。为此，他多次召开县委和党团员骨干分子会议，研究斗争策略，制定斗争方法：（1）口头宣传，在茶馆、农贸栈等群众集中的场所，揭露县政府发行“流通券”的骗人真象；（2）以中国共产党商城县委员会名义印发《告商城同胞书》，在全县造成声势，号召人民拒绝使用。为保密起见，《告商城同胞书》传单在城东罗家坳团员家刻印。由党团员分组在城关和四乡张贴、散发。一夜之间，全县到处贴满了传单和标语，群众见有共产党撑腰，一致拒绝使用“流通券”，不到半个月“流通券”就不流通了。斗争的胜利，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，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，一致赞扬共产党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。

1928年9月下旬，易宗邦调任罗山县委书记。他莅临罗

山后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，建立农民武装。为了便利工作，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，这年冬，他将县委机关由城关迁至南李店。此时，罗南农民运动在黄麻暴动的影响下，犹如燎原之火，迅猛异常。易宗邦积极引导这一运动的开展，并很快在罗南建立了南李店、余湾等五个党支部。到1929年春，罗山全县党员发展到120余人，建立支部26个，为后来罗南农民暴动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29年5月6日商城起义成功后，为扩大根据地，“实现商（城）固（始）两县割据”，信阳中心县委一度派遣易宗邦去固始帮助指导工作。易宗邦到固始县后，立即和固始县委书记蔡仲美等领导成员一起，深入毗邻商城边境的东南乡村，积极发动广大农民群众，加强“扁担会”组织。固始县扁担会是一自发的群众组织。后在我党的领导下，逐步发展成为抗粮、抗租、抗税、反豪绅、反贪污的群众进步团体。到1929年底，在扁担会中建立起张广、黎集、老胡集、泉河铺、罗集等九个党支部，发展会员千余人，成为一支强大的群众武装组织，和商城革命斗争遥相呼应，联成一片。

1930年春夏，李立三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。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》的决议，要求各地成立“行动委员会”，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。在这个错误主张的影响下，河南省成立了在“北方行动委员会”领导下的

“总行委”。全省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“行委会”组织。此时，易宗邦由罗山调往洛阳行动委员会工作。

1932年秋，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失利，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。此时，在恶劣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的易宗邦，被坏人告密，惨遭敌人毒手，牺牲于固始县三河尖。时年34岁。

本文主要资料来源：

- 1、黄宪孟搜集：《易宗邦材料》，1984年12月1日。
- 2、蒋明华：《峥嵘的岁月，坎坷的历程》。
- 3、严仿武的回忆，1960年。
- 4、刘复生的回忆，1960年10月26日。
- 5、韩宗德访问整理：《大荒坡第一暴动》，1980年1月22日。
- 6、1929年2月11日郭树勋给中央的报告。
- 7、《（河南）省委组织报告》，1930年。
- 8、游文山、姜正中、蔡善仿、朱怀同等人的回忆，固始县委党史办存。
- 9、访问蒋明华、刘复生等人谈话记录。